

## 我国高质量发展中有效供给形成的 战略选择与实现路径<sup>〔\*〕</sup>

○ 任保平, 刘鸣杰

(西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7)

〔摘要〕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方向在于促进有效供给形成, 而促进有效供给形成必须从供给主体、产品供给、要素供给等方面着手。新时代有效供给形成机制的战略选择在于以解决结构性矛盾为改革方向: 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 健全要素价格形成机制; 加强政府对企业生产活动的监管, 抑制落后产能、污染产能的形成; 促进规模驱动型增长转向创新驱动型增长,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新时代有效供给形成机制的实现路径在于破除供给主体、产品供给、要素供给层面存在的约束; 供给主体层面必须正确处理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 充分发挥企业主体地位, 激发各类市场企业创业、创新活力; 产品供给层面必须通过科技创新打破产品“低端供给”, 不断完善产品质量管理, 适应消费需求升级方向; 要素供给层面必须以要素市场约束为出发点, 从劳动力、土地和自然资源、资本、技术创新、制度等五个要素层面采取措施破除供给抑制, 促进有效供给形成。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有效供给; 形成机制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18.04.005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并进一步明确指出: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 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 显著

---

作者简介: 任保平(1968—),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博士生导师; 刘鸣杰(1994—),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常态下地方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监测预警系统和政策支持体系构建研究”(编号: 15ZDA012)成果。

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在这一表述中，“供给侧”进一步延伸为“供给体系”，这说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大背景下，供给侧改革不再简单等同于“三去一降一补”，而是具有深刻的系统性特征。在这一系统性改革中，提高和改善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其核心方向在于促进有效供给的形成。因此，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的大背景下，应当立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系统性特征，从供给主体、产品供给、要素供给等方面积极探索有效供给形成机制的战略选择和实现路径，进而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使得新时代的经济的发展更加平衡和充分。

### 一、有效供给形成机制的理论机理分析

在中国经济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高质量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目标，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促进有效供给形成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因此，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进一步研究有效供给的形成机制。

1. 供求平衡机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作为商品按交换价值在市场上出售并实现市场平衡的前提，商品产量必须与社会对该商品的实际需求相适应，然而现实状态下社会需求的不断变化将导致某些商品产量大于或小于社会需求的情况出现，这就需要通过市场机制引导供求关系趋于平衡。其内在机理在于，虽然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商品价值层面没有差异，但是在决定商品有用性的使用价值层面却存在差异。当社会对商品使用价值的实际需求随着经济发展阶段变化而改变时，如果产品结构不能及时调整或者产品使用价值存在缺陷而不能被消费者接受，那么其交换价值就失去了基础，其价值就无法得到市场实现。此时就有可能出现商品使用价值与社会需求结构不适应的情况，从而产生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最终使得市场无法实现供求平衡。因此，要解决上述问题，必须从供给侧出发，调整供给结构以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

2. 分工专业机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分工一方面作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动力之一，能够有效降低生产成本，扩大市场规模；另一方面，分工程度越高则具体劳动种类越丰富，投入交换的商品种类数量越多，即分工通过实现专业化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而当前我国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目的在于化解结构性矛盾，而结构性矛盾的重要体现之一就在于社会分工体系的僵化、扭曲，表现为旧分工体系未打破而新分工体系未形成。<sup>〔1〕</sup>因此，改善社会分工，促进新分工体系形成就成为消除无效供给、形成有效供给的机制之一。具体包括：一是通过改善企业内分工，提高企业潜力，减轻企业压力，清理僵尸企业，从而激发供给主体创新、创业、创造的活力，以促进有效供给形成；二是通过协调国内国际分工改善生产结构，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从而保障国内产品迈向全球产业链中高端，以形成产品有效供给；三是通过社会分工的深化，以新领域、新产品、新业态促进新型分工体系形成，最终实现生产要素从低效率部门流向高效率部门，以形成要素有效供给。

3. 数量和质量互动机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社会再生产过程是

数量再生产和质量再生产的有机统一,社会再生产既是数量再生产也是质量再生产。这种统一表明生产过程中产品质量的提高是由再生产过程中数量和质量循环实现的。<sup>[2]</sup>“废料的减少,部分地要取决于所使用的机器质量”,“在生产过程中究竟有多大一部分原料变为废料,这要取决于所使用的机器和工具的质量。最后,还要取决于原料本身的质量。而原料的质量又部分地取决于生产原料的采掘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即本来意义上的文化的进步),部分地取决于原料在进入制造厂以前所经历的过程的发达程度”。<sup>[3]</sup>因此,产品质量取决于该产品生产的生产条件,而生产条件又进一步取决于生产条件所处的产业。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产品质量不仅取决于生产该产品的企业、部门,还受到其他相关企业、部门的影响,这种企业、部门在数量、质量循环过程中的相互影响决定了提高产品质量、促进产品有效供给不能仅仅考虑单一产品的生产过程,必须着眼于整个社会的再生产过程,以保证有效供给形成的连续性。

4.经济结构再平衡机制。经济结构失衡衍生出供需错配、产能过剩以及经济结构的低端锁定等问题,这些问题将阻碍经济持续增长。一方面,资源误配置会使资源过多地配置到供大于求的行业,造成产能过剩。而供不应求的行业则会因为缺少资源而造成产品供给不足,使得供需结构出现严重不平衡;另一方面,经济结构的低端锁定造成中低端产品过多,高端产品供给不足,形成市场供求不匹配。因此,促进有效供给形成,必须从供给主体、产品供给、要素供给等方面调整供给结构。而调整供给结构的路径在于进行体制机制改革,努力通过有效供给形成促进经济结构再平衡机制。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通过结构升级、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等长期因素推动供给曲线右移,扩大生产可能性边界,实现经济结构的再平衡,从而开发经济的潜在增长率。

## 二、当前我国供给体系的现状分析

进入新时代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总量矛盾,而是结构性矛盾,而且这些结构性矛盾主要表现在供给侧,具体包括:一是需求结构变化与有效供给不足的矛盾。随着人民收入水平提高和生活水平改善,居民的需求从一般物质生活需要转向了追求美好生活需要,消费倾向逐渐从数量型转向质量型,高端化、多样化消费需求日益增长。与需求结构变化相比,供给结构没有适应需求结构进行及时调整,导致无效供给过多,一些行业出现产能严重过剩和产能利用率过低等问题。二是低端供给过多与高端供给不足的矛盾。在产品供给方面,中低端产品供给严重过剩,而需求旺盛的高端产品供给不足;在要素供给方面,土地、资本等低端要素供给过多,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制度等高端要素供给不足,低端要素供给过多而高端要素供给不足的现象导致产业结构严重扭曲。上述这些宏观经济运行的结构性矛盾造成了当前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

1.无效供给过多造成大量产能过剩。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变化的不适应,

导致出现大量具备供给能力却不能满足有效需求、不能与有效需求结构相匹配的无效供给,突出表现为供给效率、供给质量低下问题。造成有效供给不足、无效供给过多的原因在于:一是高质量产品供给不足,中低质量产品供给过剩,从而表现出结构性短缺。一方面,缺乏科技含量、品牌效应以及国际影响力的产品难以满足与消费者收入水平同步提升的消费需求,表现为产品有效供给不足;另一方面,中低端产品在不能及时出清、造成大量积压库存的同时,其生产还占用大量资源,表现为无效产能、过剩产能。这方面的典型案例包括中国消费者大量抢购日本生产的马桶盖和电饭锅等产品、大量购买国外奶粉而国产奶粉因过剩被倒入河中等等。二是要素市场化改革滞后,要素价格形成机制不健全。要素价格是市场价格体系的核心,扭曲的要素价格必然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在要素端,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政府对于要素价格形成过程干预过多使得要素价格无法反映要素稀缺性和真实市场供求。具体表现为要素价格在政府干预下整体偏低,使得企业生产成本偏低,带来资源浪费性配置和产能严重过剩,产生大量无效供给。政府关于自由进入某些行业的准入限制阻碍了生产要素在行业内和行业间的自由流动,表明以市场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机制在要素市场中仍未完全形成。三是政府对企业生产的监管松懈,产生大量落后产能和污染产能。某些企业为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只考虑生产成本而忽视社会成本,为实现较低的生产成本而使用大量落后产能、污染产能的行为广泛存在。这些落后产能、污染产能在当前中央所倡导的绿色经济发展理念下无疑是无效供给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地方政府为了追求经济指标,可能对企业生产放松监管,甚至为追求短期政绩继续鼓励对这些落后产能、污染产能进行投资。政府监管的松懈使得企业负外部性管制放松,不能正确评估自身生产成本以及由生产带来的社会成本,这种激励使得企业倾向于更多使用成本较低的低端要素,产生无效供给的同时阻碍有效供给的形成。

2. 依靠低端要素的规模投入造成要素生产率低。低端供给过多与高端供给不足的矛盾,使得当前中国的经济增长更多依靠低成本劳动力、土地、资本等低端要素投入数量和规模的扩大作为主要动力。低端要素无法实现无限供给,其数量、规模无法实现无限扩张,潜在增长率在长期仍然取决于创新驱动而非规模驱动。当前,物质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的红利日益消退,而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等高端要素供给严重不足,进一步使得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从劳动力要素的角度看,中国长期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人口出生率逐年降低,到2011年中国适龄劳动人口比重为74.4%,十年来首次出现下降,与之相应的社会抚养比则在2010年达到最高点,与此同时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表明人口老龄率为8.9%,到2050年将达到30%左右。从土地要素的角度看,国土资源部的数据显示我国土地出让面积由2013年的36.7万公顷降至2016年的20.82万公顷,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可供开发土地已接近枯竭。再加上国家近年来连续出台的关于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划定永久基本农田、严控新增建设用地供应

规模、城市开发边界划定等一系列政策,使得地方政府长期以来所依赖的土地财政将难以为继。从经济增长率的角度看,已从2010年以前的年均高于10%下跌至目前年均低于7%的水平,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这些数据都表明要素禀赋变化使得人口、土地等红利逐渐消退,中国经济增长过去长期依靠的低端要素投入已不能继续持续带动经济增长。而要素驱动的数量型经济增长表现为全要素生产率低下。按照索洛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定义是各要素集合产生的生产率与各要素单独投入产生的生产率之和的差值,用来表示要素质量和资源配置效率提高、技术进步以及规模经济等。全要素生产率偏低使得要素配置效率低下、配置成本过高,具体表现为:一是房地产行业吸收过多投资,使得用于促进新兴产业发展的物质资本和技术创新要素投资严重不足;二是忽视对人力资本的投资,过度重视物质资本,使得经济的创新能力不足。<sup>[4]</sup>当经济增长受到要素供给数量的限制时,偏低的全要素生产率抑制有效供给形成,阻碍经济增长潜力提升。

### 三、我国高质量发展中有效供给形成的制约因素

供给体系的质量主要是针对供给体系中低端要素、低端生产、低劣产品、低效供给等问题,围绕高质量供给主体、高质量要素供给、高质量产品供给等的关键环节提升质量的目标和措施。从我国供给体系的现实状况来看,有效供给形成的约束条件主要表现在:

#### 1. 供给主体的制约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实现市场机制配置资源,这就要求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有效供给形成过程中,必须坚持以企业作为供给主体。目前,供给主体存在的主体错位、缺乏活力等问题阻碍了有效供给形成。

(1)政府投资和企业投资存在失衡,供给主体错位。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投资的作用在于启动经济增长,而企业投资的跟进才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当前我国在扩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过程中,受到市场准入壁垒和政府配套服务机制不完善的限制,企业投资跟进不足,进而产生投资主体错位和失衡问题。政府在投融资领域内的简政放权仍然不到位,对于民间投资的引导不充分,企业作为投融资主体的市场主体地位尚未得到充分确认,表现为供给主体错位。

(2)企业结构存在失衡,供给主体活力不足。具体表现为:一是企业规模结构失衡。大型国企占据资源过多,导致中小型民营企业的发展环境严重受限,民营企业发展“只有质没有量”的问题广泛存在。企业规模结构失衡使得经济发展的民间推动力日渐枯竭。二是企业市场结构失衡。市场中同时存在的过度垄断和过度竞争使得经济运行出现秩序混乱和效率损失。三是企业行业结构失衡。传统行业企业仍然占据行业结构的主导地位,现代行业企业数量不足。企业结构失衡使得企业作为供给主体活力不足,阻碍有效供给形成。<sup>[5]</sup>



## 2. 产品供给的制约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在于建立有效供给的长期机制,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灵活性和适应性,这意味着产品供给必须赢得消费者。大量具备生产能力却不能满足消费者需求结构变化的产品是无效供给产生的重要原因,企业不能及时生产适应消费需求的产品成为阻碍有效供给形成的约束条件之一。产品供给约束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1)创新能力不足导致产品“低端锁定”。长期以来,我国企业重视技术引进、缺乏自主创新的特点导致产品的技术含量大多不高,出现“低端锁定”问题。主要表现为:一是低层次产品不能满足国内市场消费者需求升级。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的普遍提高,消费由中低端向高端发展,人们对产品层次的要求逐渐由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产品转化为满足美好生活需要的产品,而企业对新产品开发、创新的投入不足使得产品供给滞后于消费需求,造成供求错配、产品过剩;二是低端产品不能适应日趋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一方面工资水平提高导致产品生产的劳动力成本不断攀升,另一方面核心技术缺乏使得低端产品行业处于低利润、低附加值状态。二者的矛盾使得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不仅难以立足国外市场,而且在国内市场的生存空间也将被国外高端优质产品挤占,最终形成无效供给。

(2)质量管理欠缺致使高质量产品供给不足。当前,我国产品生产规模迅速扩大,产品生产数量处于较高水平,而产品质量发展不均衡,发展水平仍然较低,产品质量问题突出。而企业作为生产者依然缺乏产品质量管理意识,更加阻碍了高质量产品供给的形成。一是产品生产缺乏质量管理。由于生产规模、生产成本等差异,国内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对产品质量管理的重视程度参差不齐。许多中小企业为了在短时间内扩大产出、降低生产成本而忽视产品质量,生产过程缺乏科学合理的质量管理措施,使得产品质量问题严重突出;二是产品定位缺乏质量意识。企业对产品使用的定位仍然处于低质量阶段,不能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进行产品供给,产品定位缺乏对消费者的关怀,导致产品实际质量与消费者对于高层次、高质量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相背离。

## 3. 要素供给的制约

一般认为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土地和自然资源、资本、技术创新和制度。在中国经济处于规模驱动的数量型增长阶段时,劳动力、土地和自然资源以及资本要素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十分显著。随着当前中国经济转向创新驱动的质量型增长阶段,传统三要素投入受到数量和规模限制,技术创新和制度要素的重要性更为凸显。结合当前的经济现实,这些要素层面均存在明显的供给抑制和供给约束,阻碍了有效供给形成,不利于释放经济增长潜力、提高经济增长活力。<sup>[6]</sup>

(1)劳动力要素存在的供给抑制。当前劳动力要素面临的约束包括:第一,从劳动力供给数量层面看,长期以来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我国人口生育率常年

处于低水平,这意味着依靠廉价劳动力近乎无限供给和充裕社会劳动适龄人口的人口红利已经逐渐消失。第二,从劳动力供给结构层面看,也存在严重供给抑制,具体表现为:一是人口老龄化现象明显。随着居民生活水平和社会医疗水平的提高,死亡率下降使得人口结构中老年人口比重迅速上升,严重制约经济增长潜力。二是低素质劳动力过多,高素质劳动力不足。从需求侧看,随着我国产业发展模式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型,企业对低素质劳动的需求逐渐减少,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逐渐加大。从供给侧看,我国劳动力整体受教育水平和程度仍然较低,能够提供的高素质劳动力绝对数量十分有限,更突显出低素质劳动力过剩。因此,劳动力层面存在的结构性矛盾极大限制了产业结构升级。此外,随着进一步化解过剩产能、清理僵尸企业,更多低素质劳动力将流向市场,进一步加剧劳动力市场的资源错配和供求矛盾。<sup>[7]</sup>

(2)土地和自然资源要素存在的供给抑制。当前我国土地要素市场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一是农村土地征收制度存在弊端。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大量农村用地(包括集体建设用地和宅基地等)转化为城市建设用地,用于工业发展和商品住宅建设,而在这一过程中土地不能自由流转而须通过政府进行土地征收。现行农村土地征收制度并不按照市场化程序在土地市场招标拍卖,农村土地被征收后由土地增值带来的收益农民无权获得补偿,农村土地要素价格扭曲,严重损害农民利益。二是城市用地结构不合理。一方面城市用地大量用于商品住宅建设,导致商品房库存数量巨大,另一方面由于资本空转、房价虚高造成了房地产泡沫的产生。不合理的城市用地结构使得房地产行业大量占用城市用地,造成公共保障房用地、经济新业态用地以及健康、养老产业等其他民生项目用地严重不足。<sup>[8]</sup>这些问题不仅产生了大量社会冲突和群体性事件,更加剧了土地要素供求的严重错配,使得有效供给难以形成。

其他自然资源要素的供给也存在严重问题。一是高消耗发展方式与资源禀赋约束之间的矛盾。我国经济增长和工业化进程曾长期依靠自然资源的高消耗,在我国人均自然资源短缺、自然资源供给规模有限的国情下,这种粗放、低效的发展方式难以为继,阻碍了经济可持续发展。二是高污染的发展模式与环境保护政策目标之间的矛盾。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十九大报告中也把生态文明建设列为治国理政基本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自然资源过度消耗和高污染排放的现状并非简单依靠节能减排措施所能解决,地方政府往往在实现短期经济增长以满足绩效指标的动机激励下鼓励高耗能、高污染的工业生产。由于新能源和低碳经济发展尚不成熟,这种工业生产方式在短期内难以改变,因而与环境保护政策目标相互矛盾。

(3)资本要素存在的供给抑制。资本要素市场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第一,投融资体制不完善。政府在企业提供投融资政策优惠时存在不合理的选择性,促使大量资本流入房地产、钢铁、化工等产能过剩行业,进一步推高了房价,催生了大量僵尸企业,而大量新兴行业企业和中小型民营企业却难以享受到投

融资政策优惠,融资渠道不畅通问题普遍存在。第二,金融市场发展不完善不充分,金融体制存在重大问题。具体包括:一是金融市场结构存在失衡问题。我国经济长期依靠货币市场借贷融资等间接金融,直接金融不足。这种结构失衡抬高了融资成本,一方面进一步加剧了中小微企业面临的融资难现象,不利于实体经济换代升级;另一方面各种金融资源主要依靠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通过借贷手段进行配置的模式使得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过度依靠借贷杠杆,使得宏观经济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可能性加大。二是金融市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不足。从宏观经济运行的角度看,金融市场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金融资本必须通过与产业资本密切结合以促进经济增长。当前我国金融市场中金融资本自行空转的问题十分明显,导致金融资源错配严重,资本难以流向实体经济,使得金融市场发展难以发挥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

(4)技术创新要素存在的供给抑制。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阶段已逐渐体现出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特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发展创新型经济模式就成为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然而当前我国技术创新要素所面临的抑制和约束却阻碍了创新型经济模式的形成。一是科技创新驱动力不足。科学理论和基础研究持续投入机制不完善,使得科研人员从事学理和基础研究缺乏激励,动力不足;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足,阻碍科技创新的深化和投入;科学研究与市场和应用严重脱节,使得新的科技成果缺乏及时转变为创新产品、创新应用的激励,科学研究不能及时转化为生产力。二是教育体制僵化,人才培养机制存在缺陷。从表面上看,科研人员发表论文数量、申请专利数量总量大、增速快,实际上这些科技成果转化为产品、应用的比例很低。其原因就在于行政化的教育体制和应试化的人才培养机制使得我国高等教育难以培养出创新型人才,出现了“钱学森之问”的难题。三是政府科技管理体制存在弊端。一方面,科学研究从立项到评估再到资助最后到结项的全流程控制权都掌握在政府手中,使得科技创新过程缺乏弹性和活力;另一方面,科技创新长期由政府不同部门分别管理,政出多门,资源分散,部门间利益分割和资源、信息共享壁垒阻碍了技术进步。

(5)制度要素存在的供给抑制。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前提之一是坚持制度创新,有效供给的形成需要持续提供制度的供给和创新作为保障。当前制度要素存在的约束和抑制主要存在于政府层面。一是政府职能不清晰,“越位”、“缺位”现象突出。政府职能“越位”问题表现在政府对宏观经济运行的过度管制和对微观经济主体的过度干预,行政审批权力带来的寻租空间使得政府缺乏自觉实现职能转变、加快简政放权的动力;此外,政府职能“缺位”问题也较为严重。现代市场经济要求建设和发展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而当前我国政府在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公共服务、土地管理、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制度供给和创新滞后,各部门之间权责不清、“推诿扯皮”现象普遍存在。二是制度供给与新常态下经济长远发展目标相背离。主要表现在官员考核指标过



于单一偏颇,仍然以 GDP 指标来作为官员政绩与晋升的主要考核指标,忽视对创新水平、结构性调整、社会治理等新常态下长期经济发展指标的评价,进而激励各地方政府以短期经济增长为目标,大搞重复建设和低端产业,使得产能过剩更加恶化,无效供给难以消解。

#### 四、我国高质量发展中有效供给形成的战略选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力点是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因此我国高质量发展中有效供给形成机制的战略选择必须以化解结构性矛盾为导向,针对当前有效供给形成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市场机制和政府作用的结合,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促进有效供给的形成:

1.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健全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我国高质量发展中有效供给形成首先必须解决市场机制的扭曲,健全要素价格的形成机制。一是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进行要素端改革。在要素端必须遵循由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本规律,减少政府对于要素的直接配置和不当干预,依据市场规律、市场规则和市场标准推动要素配置,实现资源再配置的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二是稳步深入推进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当前要素市场分割及由其带来的要素价格形成多轨制造成要素价格严重扭曲,严重阻碍有效供给形成。因此,必须稳步深入推进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提高要素价格市场化程度,使其能够体现要素供求状况,进一步推进要素合理配置,促进全国统一的要素大市场的形成和“统一、开放、竞争、有序”要素市场体系的建设。以提高要素配置效率为目标推动要素流动,促进要素由低效需求向高效需求流动,由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流动,由价值链低端向价值链中高端流动;进而推动资源再配置,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2.加强政府对企业生产活动的监管,从源头化解无效供给的形成。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有效发挥政府作用,强化对企业生产活动的监管。通过严格监管强化对企业生产的负外部性管制,倒逼企业在生产决策时综合考量社会成本、环境成本,从而有效抑制由于企业低估成本造成的落后产能、污染产能,从源头化解无效供给问题。加强政府监管,一是要坚持共享发展理念,适度控制劳动力相对于资本过低的收益率,保障劳动者基本权益,增加劳动者福利,缓解劳资矛盾;二是要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强化对企业排污情况的监控,对生产活动中的污染行为采取征税、收费、罚款等措施以使企业产生的社会成本、污染成本内部化,进而抑制落后产能、污染产能。

3.促进规模驱动型战略转向创新驱动型战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破解要素规模不能无限供给对经济增长潜力的限制,保持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必须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为长期目标,在经济增长方式上从规模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型,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因此,必须大力发展以创造新资源为目标、以新技术和知识为依托、以创新为驱动、以创新型企业为主体的创新型经济。<sup>[9]</sup>这就要求我们:一是以科技创新取代要素规模投入,通过创新促进要素流向价值链中

高端。当前我国要素主要流向位于价值链低端的产业,这些产业往往是高资源消耗、高劳动密集度的低附加值产业。当要素禀赋条件发生变化、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要素使用成本提高时,要素投入就很难获得较高收益。因此,要解决这一矛盾必须通过技术创新促进要素从价值链低端进入价值链中高端。二是以人力资本积累取代物质资本积累。人力资本包括企业家才能的培育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等方面。在创新驱动型增长阶段,物质资本积累受到限制,因此必须通过人力资本的积累引领要素高效率配置,倡导技术、知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有效供给形成。

## 五、我国高质量发展中提高有效供给的实现路径

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是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而供给体系质量的提高需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有效供给的形成。高质量发展中有效供给形成的路径在于:

### 1. 释放供给主体活力,提高供给主体的质量

供给主体存在的主体错位、活力不足等问题成为有效供给形成的约束之一。深化供给侧结构型改革,促进有效供给形成必须从供给源头出发,正确处理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企业主体地位,进一步落实企业经营自主权,以激发各类市场企业创业、创新活力。

(1)积极促进企业投资,优化投资主体结构 and 供给主体结构。针对政府投资和企业投资的失衡,必须通过积极促进企业投资,扭转长期以来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政府投资的现象,对投资主体结构和供给主体结构进行优化升级,进而破除供给主体错位的约束。具体措施包括:一是在推动企业投资转向基础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同时,适当开放公共产品和服务行业以吸引企业投资;二是政府要加强对企业投资的合理引导,为投资主体提供充分信息支持和完备政策环境,从而提高投资项目技术含量;三是从人才培养、社会保险等方面为企业良好投资环境。

(2)通过企业组织能力优化释放供给主体活力。企业组织能力优化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保障,其核心在于激发企业活力,关键在于为企业减负,降低企业发展成本,以保证企业提供有效供给的积极性。具体措施包括:一是通过降低税费、交易成本、融资成本、社会保障成本等方式为企业减负,提高企业生产、经营、创新的积极性,释放企业活力;二是通过组织能力优化增强企业创新能力,进而提高企业供给质量,提升供给效率,优化供给结构,激发供给主体活力;三是通过核心技术、品牌效应、创新管理等要素促进创新型企业成长,为进一步促进有效供给形成、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组织保障;四是通过完善公平竞争、促进企业健康发展的政策和制度,鼓励企业各类创新活动,进一步完善企业创新环境。

(3)通过激发企业家精神推动企业自主创新。企业家精神是当前中国经济

运行过程中最为稀缺的要素之一,其显著特征在于熊彼特所称为的“破坏性创新精神”和“必要的冒险精神”,这种精神支撑着企业的自主创新。因此必须健全企业家精神激励机制,在全社会范围内营造企业家创新的气氛,使得优秀企业家依靠自身商业嗅觉和市场感知创造新产品、拓宽新产业、创造新供给,以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理想经济运行轨道实现有效供给形成。<sup>[10]</sup>

## 2.适应消费结构升级,提高产品供给的质量

产品生产和服务是国民经济的微观基础,从源头上决定着经济增长质量和竞争力。因此,进一步深化供给侧改革、促进有效供给形成必须以提高产品质量为核心、以科技创新为驱动力、以适应消费结构升级为方向打破产品供给约束。

(1)通过科技创新打破产品“低端锁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产品质量是由劳动质量决定的,因此科技创新和劳动力素质提升是提高产品质量、扩大产品有效供给的关键和保障。一是推动企业自主创新以提升产品质量。只有转变长期以来产品生产依靠技术引进、技术模仿的现状,以自主创新实现技术进步,才能不断提高企业设备先进程度和工艺水平,从源头上加快产品更新换代速度、实现产品质量提升;二是加大人力资本投入以提升产品层次。只有把人力资本积累作为企业进行产品研究的推动力,才能提高企业生产所需劳动力的质量,形成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体系,从而不断提高产品层次;三是通过培育创新性领军企业将国内产品推向国际市场。当前,质量竞争已经成为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的核心,国内产品要推向国际市场必须提高产品质量。因此,必须通过开发新技术、掌握新工艺、引进新设备等措施培育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领军企业,从根本上推动整个行业产品质量提升,从而将国内市场过剩产品转化为国际市场畅销产品。

(2)通过完善质量管理扩大高质量产品供给。生产和管理过程是企业经营的主要内容,而保证产品质量必须从生产过程的质量管理入手。一是不断加强企业质量管理意识。只有提高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的质量管理意识,让质量意识融入所有企业员工的日常工作,开创质量管理新局面,才能通过产品质量形成品牌效应,由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创造;二是进一步明确企业在质量管理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企业必须充分结合大数据时代的特点,利用信息技术、人力资本积累、物质资本改善等有利因素,以产品质量提升为核心,将技术创新与质量管理相结合,制定更为严格的质量管理规范,扩大高质量产品有效供给。

(3)通过适应消费结构升级调整产品供给方向。随着消费水平提升和消费结构升级,社会整体消费层级迈入中高端,居民对于消费品质量、档次的要求也随之提升,表现为消费的绿色化、健康化、智能化等倾向。因此,消费结构升级应带动产业结构升级,企业生产必须与消费升级方向相适应、迎合消费者新需求才能实现产品的市场出清。一是产品供给必须在品牌、质量、个性化、专有功能等方面实现突破<sup>[11]</sup>;二是产品生产企业必须利用大数据手段,通过对消费者的购买行为进行分析,获得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和实时诉求,从而有针对性地进行市场

分层生产。通过为消费者打造专属产品的形式,提升消费者满足感,实现产品有效供给。

### 3.破除要素供给约束,提高要素供给的质量

要素端存在的供给抑制和供给约束是有效供给形成机制面临的主要约束条件之一,因此必须从劳动力、土地和自然资源、资本、技术创新、制度五个要素层面采取一系列措施破除现存的供给抑制和供给约束,促进有效供给形成机制的实现,进一步解放当前受到约束的经济增长潜力,提升经济增长活力。

(1)提高劳动力要素供给质量,开发人力资本红利。高质量发展要从人口红利转向人力资本红利。为了破除劳动力要素在数量层面和结构层面存在的供给抑制,发挥人力资本红利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及时调整人口生育政策。为了解决人口萎缩、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成本上升等问题,必须逐步全面放开人口计划生育。应在全面放开二胎生育的基础上,保证相关配套政策措施的完善。一方面逐步减弱政府对人口生育的控制性立法干预,保证人口自然增长;另一方面通过取消晚婚晚育限制、完善生命保险制度、改革生育登记制度等与人口生育政策相配套的措施大力促进人口增长率提高。二是全面改革户籍制度。我国现行户籍制度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产物,当前已经严重阻碍了劳动力自由流动。一方面,在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成为城市建设者,有权利享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优惠政策。户籍制度改革必须依托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顺应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的城镇化历史性趋势。另一方面,适度放开移民政策,吸引创新型人才和熟练技术工人,充分利用其他国家高层次人力资源。三是实施以提升创新能力为核心的人力资本战略。以创新型人才、技能型人才培养为着力点,完善和优化人才培养体制机制,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制度环境不断优化,提升高素质劳动力供给数量和水平。

(2)以绿色发展理念为指导,提高土地和自然资源利用效率。由于土地和自然资源的不可再生性,解决土地要素供给的关键在于加快土地制度改革,提高土地和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一是健全完善现行农村土地制度。农村土地制度是当前土地制度改革的主要焦点,而促进土地经营权有效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主要方向。通过进一步修订和完善《土地承包法》、推进土地确权登记、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手段,稳定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进一步引导农村土地有序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此外,还要建立健全农村土地交易标准化规则,防止农村土地用途发生改变。必须通过立法形式保护农村集体建设用产权,进一步完善宅基地收益获取保障机制,促进城乡一体的建设用地市场机制的形成。二是深化城市建设用地管理体制的改革。一方面,必须建立城市建设用地调控机制,积极控制用地规模,严格执行用地标准,合理安排用地分类。提高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程度和水平,盘活建设用地存量,提升土地利用效率。另一方面,必须加大房地产去库存力度,同时修改现行土地招标采购制度,扭转地



方政府财政收入对土地出让金的过度依赖,从而降低虚高的土地价格,防止房地产泡沫破裂。针对其他自然资源要素,必须以绿色发展理念为指导,大力发展绿色经济。一是转变高消耗的发展方式。鼓励引导生产部门加快生产方式创新,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带动集约化发展,以资源利用效率提高突破自然环境禀赋约束;二是转变高污染的发展方式。以建设“美丽中国”目标为指引,一方面改善能源结构,减少化石能源使用,积极寻找和大力开发新型替代能源,发展低碳循环经济;另一方面大力发展绿色产业,以产业结构升级带动生态环境治理,淘汰落后产业和污染产业,消解低效产能和污染产能。

(3)改善资本利用效率,提高资本要素供给的质量。对于资本要素存在的供给问题,必须从投融资渠道和金融市场深化改革入手。具体措施包括:第一,在投融资领域内深入推进政府简政放权,建立和完善新型投融资体制。一是进一步明确政府、企业在投融资领域中的地位。必须明确界定企业作为投融资主体的市场地位,限制政府对于投融资的干预和管制,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以政府为引导的投融资新模式。二是规范政府投资,鼓励民间投资。一方面,政府投资应重点投向非竞争的公共服务、公共产品、社会公益领域和基础研究、产业研发的创新领域。另一方面,通过发展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促进政府投资、民间投资结合,为民间投资提供高效政府服务环境以充分挖掘社会资金潜力,带动民间投资。第二,充分发展完善金融市场,建立健全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相适应的金融体制。为此必须放松金融压抑,扩大金融有效供给,促进金融市场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这就要求我们:一是优化金融市场结构,扩大直接融资。必须科学合理地确立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比重,加快形成完备、有效、合规的股票市场,促进投融资体制由间接投融资主导向直接投融资主导转化,从而进一步降低企业的投融资成本,提高生产经营效率。同时降低借贷杠杆率,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促进经济平稳运行;二是促进金融与实体经济有机融合。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因此发展金融业必须以服务实体经济为目标。必须坚持以支持实体经济为中心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破除金融压抑,以促进实体经济换代升级。三是增加金融市场有效供给。通过金融产品、金融机构、金融政策的有效供给,矫正金融资源存在的扭曲和错配现象,推动金融产品创新和业务创新。

(4)完善协同创新机制,提高技术要素供给的质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技术创新作为新动力,因此必须建立健全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相适应的科技体制。一是完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机制。通过知识、技术、产品、产业等层次的创新协同,促进基础研究和应用推广实现一体化,市场需求与科技创新实现有效对接,最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新生产力;二是建立官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以企业为主导,以企业、高校、科研院所、政府为多元创新主体,建立多方参与、协同合作的官产学研创新平台。<sup>[12]</sup>三是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必须以改变应试教育模

式和教育体系去行政化为主要方向进行教育体制改革,建立以创业创新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机制,为发展创新型经济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

(5)深化改革,提高制度供给的质量。针对政府层面存在的制度供给约束,必须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一方面,通过加大减税降费力度激发微观经济活力,通过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保证简政放权依法依规推进,转变政府宏观经济管理方式,放松对经济的管制,以解决政府职能“越位”问题;另一方面,通过不断规范财政管理、土地管理、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制度体系,促进新的制度供给不断形成,以便有效建设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通过中央政府加强统筹、强化顶层设计和提供标准化行政指南<sup>[13]</sup>等措施杜绝各部门的权责不清、“扯皮推诿”现象,以解决政府职能“缺位”问题。二是促进制度供给,对接新常态经济发展长期目标。通过构建质量效益型政绩考核晋升体系,在GDP指标基础上引入创新水平、资源利用效率、生态环境保护等长期经济发展指标,以新的激励扭转地方政府为谋取短期经济增长不顾长期发展目标的施政行为,从而在源头处杜绝重复建设、低端产能,以化解无效供给,为有效供给形成腾出空间。

#### 注释:

[1]张如意、任保平:《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政治经济学逻辑》,《人文杂志》2016年第6期,第20—25页。

[2]任保平:《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逻辑及其现实性》,《人文杂志》2018年第2期,第26—34页。

[3]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17—118页。

[4]洪银兴:《准确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和任务》,《中国工业经济》2016年第6期,第14—21页。

[5]任保平:《结构失衡新特征背景下加快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机制》,《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3期,第73—80页。

[6]贾康等:《“十三五”时期的供给侧改革》,《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第12—21页。

[7]徐淑云:《生产要素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第154—161页。

[8]楚明钦:《产业发展、要素投入与我国供给侧改革》,《求实》2016年第6期,第33—39页。

[9]任保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路径与政策转型》,《黑龙江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第46—51页。

[10]魏婕、任保平:《经济失衡、增长困局与供给侧改革逻辑》,《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0期,第54—59页。

[11]任保平、付雅梅:《系统性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路径探讨》,《贵州社会科学》2017年第11期,第105—112页。

[12]任保平:《我国供给侧改革结构性改革的本质:体制改革》,《社会科学辑刊》2017年第2期,第21—28页。

[13]韩敬云:《制度创新与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央民族大学硕士论文,2017年。

〔责任编辑:马立钊〕